

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综述

赵欣 原海兵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中国北方位于欧亚大草原东端,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一条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游牧文化带。在这条文化带上,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类型的共性,历史上曾先后崛起过众多强悍的游牧民族,他们在中国北方乃至整个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历史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匈奴、鲜卑就是其杰出代表。

欧亚草原地带,特别是在我国境内陆续发掘并采集到多批有关匈奴和鲜卑的人骨材料,为研究匈奴、鲜卑民族的形成、迁徙、流向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人种学资料。关于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特别是对匈奴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化的研究课题,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旨在通过总结归纳这些发现、研究及技术和方法的更新,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对匈奴、鲜卑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一、匈奴的人种学研究

据文献记载,匈奴这个名称始见于战国时期。匈奴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北方草原的一支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逐渐衰落。作为一个强大的草原游牧民族,匈奴人曾经在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

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当他强盛的时候曾对其邻族频频发动战争,侵占土地,掠夺财物。他与秦汉王朝时战时和,关系非常密切。公元一世纪中叶,在东汉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匈奴人内讧,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降汉,北匈奴西迁。此后直至五世纪,被某些西方史学家称为“上帝之鞭”的北匈奴骑兵的铁蹄越过中亚横扫东欧,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内迁的南匈奴人逐渐与其他民族杂居、融合,至南北朝后期,匈奴族称日趋消失。

对于匈奴人的种族类型,中外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许多推测,但多数是仅从古代文献的记述和语言学特征等方面进行论述。王国维曾根据《晋书》中关于羯胡相貌特征的描述,推测作为羯胡祖先的匈奴人的面貌亦应是深目、高鼻、多须,与西胡无异^①。黄文弼根据陕西咸阳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上对匈奴人面目的刻画,“面阔多须髯,唇厚鼻平,目小,其眼睑作三角形”等特征,断言匈奴为蒙古人种^②。从东罗马帝国史学家乔丹斯^③和威格尔^④在史学著作中对匈奴人的描述中可以判断,匈奴人及其后裔的体质特征与欧罗巴人种差别显著,应是蒙古人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推测构成匈奴族的主干成分应为蒙古人种^⑤。但法国学者伯希和对汉文译本所

提供的匈奴词汇进行反复核对、全面分析，几次巧合后他认为匈奴人应属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⑥。奥地利学者奥图·敏岑海尔芬则根据西方史学家对匈人体形面貌的记载和近世有关匈奴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分析，认为匈奴属于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合类型^⑦。上述各观点的立论根据都不是直接来源于考古发掘的匈奴人骨材料本身，因此结论往往难以完全令人信服。相比而言，对匈奴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显然更具说服力。

早在 20 世纪中期，前苏联学者和匈牙利学者就开始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探讨匈奴的人种构成问题。主要包括有：前苏联学者捷别茨对贝加尔湖伊里莫夫谷地匈奴人骨的研究^⑧、格赫曼对外贝加尔地区匈奴人骨的研究^⑨、金兹布尔格和日罗夫对肯科尔地区卡达孔巴墓地^⑩、天山和阿莱地区^⑪以及哈萨克斯坦^⑫出土匈奴人骨的研究、匈牙利学者托思对诺音乌拉附近的胡吉尔图 2 号墓采集的颅骨以及呼尼河沿岸的匈人颅骨的研究^⑬、雷麦斯克瑞对匈牙利境内安东尼、杰尔时代（公元 4—5 世纪）匈人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等^⑭。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阿列克谢耶夫、格赫曼、杜门为代表的前苏联体质人类学家在系统整理上一时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对匈奴的人种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们系统地分析了中央亚细亚，包括蒙古地区、图瓦地区、阿尔泰地区、哈卡斯地区以及外贝加尔地区匈奴人的人骨，认为匈奴人是以蒙古人种因素为主体、混入少量欧罗巴人种成分的混合群体^⑮，杜门在对蒙古境内不同地区匈奴墓葬中出土的 38 例颅骨研究后认为蒙古与外贝加尔匈奴人的类型基本一致，只是外贝加尔匈奴人的面部较蒙古匈奴的稍高一些^⑯。

与此同时，我国的体质人类学家也开始了对匈奴进行人种学研究。最早是潘其风和韩康信两位先生对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东汉匈奴墓的颅骨进行研究，得出桃红巴拉人骨接近蒙古人种的类型，大通东汉匈奴墓颅骨与北亚蒙古人种有较密切的联系^⑰。

潘其风先生将匈奴人的体质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 早期匈奴（公元前三世纪以前）：以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两个墓地的人骨为代表，均属蒙古人种，具有东亚人种和北亚人种混合的特征。2. 中期，民族融合阶段（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属于该阶段的人类学材料目前我国尚未发现。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多有发现，既有欧罗巴人种，也有属于蒙古人种，他们共同生活，这正是民族融合反映。他还推测，构成北匈奴的主体成分应该是古西伯利亚类型，与我国大通出土的匈奴人骨特征不同。由此他估计南、北匈奴在体质特征上可能早就存在着差异。3. 分裂后的匈奴（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该阶段材料在我国只有大通上孙家寨一处，其体质特征较接近北亚蒙古人种，与东亚人种也存在一定的联系。而西迁之后出现在欧洲的北匈奴后裔匈人则具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混合的特征^⑱。

朱泓先生也对我国境内和俄罗斯、蒙古境内出土的匈奴人骨材料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匈奴族的人种构成是多元的，活动于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和西伯利亚的匈奴族居民，在种系成分上主要为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在略晚时期又增加了某些欧罗巴人种的因素；而生活在我国境内南流黄河两岸的匈奴族及其先民的体质类型中，则主要包括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两种成分。他进一步推测，北匈奴中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居民很可能就是在大漠以北的草原居民中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境内鄂尔多斯高

原和乌兰察布草原等地发现的东周时期有关人骨材料，很可能就代表了南匈奴的祖先类型。南北匈奴之间在种系构成方面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来源，而这种血缘成分的复杂性伴随着匈奴族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必然会愈演愈烈。正是这一种族渊源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离心力，早已在貌似强大的匈奴共同体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裂^⑨。

陈靓在博士论文中对国内外发现的匈奴各古代组进行分析，得出匈奴是一个人种混杂的族群，至少包括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两大类型。匈奴的主体应该是游牧于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类型人群；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是一种古西伯利亚类型人群，中亚地区的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的混血类型。我国出自新疆的材料属于古欧洲人类型与蒙古人种的混血人群，出自青海和陕北的材料与蒙古匈奴人关系更密切。并且以上类型的匈奴人的种系特征都可以在当地更古老的人群中找到源头^⑩。

张全超在研究了我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基础上得出，秦汉时期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延续先秦时期该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匈奴人种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并提出蒙古高原的古代居民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石板墓文化居民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人群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其来源应与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石板墓居民有一定渊源，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时，这些古代居民很可能最终加入到匈奴联盟；而“古蒙古高原类型”居民的后裔与“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后裔一样都是匈奴联盟中人种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⑪。

二、鲜卑的人种学研究

鲜卑族是继匈奴人之后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崛起的另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文献记载，与乌桓同为东胡后裔。秦汉之际，东胡为匈奴所灭，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在东汉和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的联合打击下兵败西迁。此时，原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鲜卑族大举南下、西进，占据匈奴故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约10万落，亦自号鲜卑，成为当时及以后几个世纪中国北部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鲜卑共同体内部又包括有许多不同的部别，大体可区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类：北部鲜卑又称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则包括慕容、宇文、段氏等部。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鲜卑各部先后建立了三燕、北魏等众多的地方政权，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相互交流与斗争中自然同化。隋唐以来，鲜卑族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鲜卑人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中。

有关鲜卑的人种学资料，目前已发表的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完工墓地、扎赉诺尔墓地、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地^⑫、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的三道湾墓地^⑬、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⑭、察右中旗商都县东大井墓地^⑮、兴和县叭沟墓地^⑯，辽宁省朝阳市的十二台营子^⑰、喇嘛洞墓地^⑱，吉林省大安县渔场墓地^⑲和山西省大同市南郊的北魏古墓群^⑳。

最早对鲜卑进行人种学研究的是潘其凤、韩康信两位先生，他们研究了完工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前两次发掘和南杨家营子墓地所获得的人骨材料。在族属上，完工颅骨较接近蒙古人种的北极类型，同时可能含有某些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

古代居民可能以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为主,还可以看到某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南杨家营子居民则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最接近,也存在某些东亚或北极蒙古人种的因素^③。

在鲜卑的人种研究中,朱泓先生作出重要贡献。他分别对出土于扎赉诺尔第三次发掘的汉代墓葬^④、三道湾墓地^⑤、朝阳十二台营子^⑥、吉林大安县渔场墓地^⑦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得出,上述古人骨均有低颅、短颅和阔颅,以及高而宽阔的面形和很大的面部扁平度,具有较明显的一致性,都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个别特征受到某些来自东亚蒙古人种的影响。此外,朱泓先生对扎赉诺尔三次发掘的头骨进行了全面考察,将之分成两组:A组以西伯利亚蒙古人种为主体,B组可归属为西伯利亚人种和北极人种的混血类型。A组与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组最为相似,并超过了与B组之间的关系;而B组却与完工组最为相似。也就是说扎赉诺尔墓地的鲜卑族居民似乎处于一种介于完工居民和匈奴人之间的过渡位置。扎赉诺尔汉代B组或许就是一组“胡父鲜卑母”或“鲜卑父胡母”的混血类型的代表^⑧。此外,通过对完工墓地的研究,朱泓先生提出了将高颅与阔面相结合特点的类型命名为“古东北类型”,作为我国东北及其邻近地区古代土著居民的一种主要体质类型的代表^⑨。

张全超等对叭沟墓地鲜卑头骨的研究^⑩,郑丽慧、陈靓等对七郎山^⑪、东大井鲜卑颅骨的研究,均得出在人种学特征上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最近^⑫。然而,陈山对喇嘛洞墓地的颅骨进行初步研究,认为这组居民的种族类型最接近现代东亚蒙古人种,同时与北亚蒙古人种存在较密切的关系^⑬。张振标等对大同市北魏时期鲜卑墓地人骨的种族特征进行研究,提出大同组以蒙古人种特征的东北

亚类型为主体,同时杂入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乌孙人类型的种族特征,明显有别于汉族的颅骨特征^⑭。

陈靓在博士论文中对鲜卑组及与鲜卑有关的古代组进行分析,总结出鲜卑人属于西伯利亚类型。在所有鲜卑组中,完工组与其他鲜卑人差异较大,结合考古学文化的考察,判断出完工居民不属于鲜卑人^⑮。

除上述的古人种学研究外,魏东等还对喇嘛洞墓地人骨进行了非测量性状的观察和研究^⑯。

三、20世纪90年代匈奴与鲜卑人种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从20世纪中期到80年代,是匈奴和鲜卑人种问题研究的原始资料的积累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匈奴和鲜卑的人种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该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将分子生物学方法引入到考古学、人类学研究中,形成了分子考古学,它利用现代分子遗传学的手段提取和分析残留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材料中的DNA分子,是获得化石和考古材料中古代生物遗传信息的方法。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从古代生物遗骸中提取DNA片段,并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美国科学家Mullis等人发现并创立了划时代的PCR技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链式反应),这一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革命性进展为古DNA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古DNA通过比较现代生物和古生物之间遗传的差异和联系,已经在古代和现代生物的谱系关系研究、濒危物种的保护、人类的起源与进化、模拟人类迁移路线、墓葬个体间亲缘关系、墓葬群体关系(族属)研究、人类遗存的

性别鉴定、古病理与饮食研究、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并对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产生重要影响。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学科交叉与多种手段结合的趋势下,必然具有无限的潜力与活力。90年代起,我国的分子古生物学、分子考古学的研究也广泛开展起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自成立以来,也开展了对鲜卑的古DNA研究,已成功地对三道湾汉代鲜卑人骨^⑤、七郎山^⑥、喇嘛洞鲜卑人骨^⑦中的线粒体DNA进行了提取、扩增、测序和分析研究。由于线粒体DNA具有多拷贝、高突变率和母系遗传等特点,是古DNA研究的一个理想的遗传标记。然而,线粒体DNA也具有局限性,只能代表母系遗传,与此相反,Y染色体是父系单性遗传的,可以弥补单一的线粒体DNA研究的不足,这将是今后开展古DNA研究的方向。

此外,在传统的人种学研究中,多种统计学方法,如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都得到广泛地应用。除研究数量性状外,有研究者还对头骨进行了非测量性状的观察与研究。

这一研究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跨国研究、整合研究的开展。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朱泓先生与蒙古国立大学体质人类学家实现了互访与学术交流,为中国古人种学研究,特别是边疆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人种学研究走向世界提供了条件。

通过上述总结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匈奴和鲜卑的人种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相信今后随着田野发掘工作提供更多的原始材料,引入更多的新方法、新技术、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必将日益深入。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趋近于历史的

真实。

附记:本文研究得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070115),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6BS33)的资助,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张全超博士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注 释

- ①王国维:《西胡续考》,《观堂林集》卷十三,《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 ②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20-28页。
- ③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1958年,169页。
- ④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1页。
- ⑤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184-216页。
- ⑥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3页。
- ⑦奥图·敏岑海尔芬:《匈奴人的世界》,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358-375页。
- ⑧捷别茨:《苏联古人类学》,《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丛刊(第四卷)》,莫斯科,1948年。
- ⑨ a. 格赫曼:《伊沃尔加城出的头骨的人类学特征》,《苏联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综合科学研究文化研究所丛刊》第3期,乌兰乌德,1960年。
b. 格赫曼:《外贝加尔的古代畜牧人的人类学特点》,《苏联民族学》第六期,莫斯科,1967年。
- ⑩ B. B. 金兹布尔格, E. B. 日罗夫:《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塔拉斯河流域肯科尔卡达空拜墓葬出土人类学材料》,《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汇集》第10卷,1949年。
- ⑪ B. B. 金兹布尔格:《中部天山和阿莱古代居民之人类学资料》,《苏联民族学研究所报告集》第21卷,1954年。
- ⑫ B. B. 金兹布尔格:《东部和中部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苏联民族学研究所报告集》第33卷,1956年。

- ⑬ a. 托思：《匈吉尔图山谷的古人类学发现》，《匈牙利考古》第14卷，1962年，249—253页。
b. 托思：《蒙古北部古人类学的一些问题》，《匈牙利考古》第19卷，1967年，377—389页。
- ⑭ 雷麦斯克瑞：《近期发现头部人工变形的一个人类学调查》，《匈牙利考古》第2卷，1952年，223—233页。
- ⑮ 阿列克谢耶夫、格赫曼、杜门：《中央亚细亚古人类学概览（石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蒙古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新西伯利亚，1987年，208—241页。
- ⑯ 杜门：《蒙古匈奴的人类学特征》，《蒙古的古代文化》，新西伯利亚，1985年，87—96页。
- ⑰ 潘其风、韩康信：《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考古》1984年第4期，367—375页。
- ⑱ 潘其风：《从颅骨资料看匈奴族的人种》，《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292—301页。
- ⑲ 朱泓：《从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7—13页。
- ⑳ ④③ 陈靓：《匈奴、鲜卑和契丹的人种学考察》，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 ㉑ 张全超、朱泓：《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3卷第6期（总第169期），34—38页。
- ㉒ ③① 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117—136页。
- ㉓ ③③ 朱泓：《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颅骨的人种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21—430页。
- ㉔ ③⑨ 郑丽慧、朱泓、陈靓：《内蒙古七郎山魏晋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1期，87—91页。
- ㉕ ④⑩ 陈靓、朱泓、郑丽慧：《内蒙古东大井东汉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1期，77—86页。
- ㉖ ③⑧ 张全超、周蜜：《内蒙古兴和县叭沟墓地汉魏时期鲜卑族人骨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
- ㉗ ③④ 朱泓：《朝阳魏晋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79—90页。
- ㉘ ④① 陈山：《喇嘛洞墓地颅骨种族类型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314—322页。
- ㉙ ③⑤ 朱泓：《吉林省大安县渔场墓地汉晋时期人骨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3年，353—361页。
- ⑩② ④② 张振标、宁立新：《伙同北魏时期墓葬人骨的种族特征》，《文物季刊》1995年第3期，21—33页。
- ⑩③ 朱泓：《扎赉诺尔汉代墓葬第三次发掘出土颅骨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第2期，123—130页。
- ⑩⑥ 朱泓：《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45—51页。
- ⑩⑦ 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
- ⑩④ 魏东、张全超、陈山：《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人头骨非测量性状的观察》，《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3年，362—367页。
- ⑩⑤ 万诚、崔银秋等：《复家店等古人骨DNA的提取、扩增及序列分析》，《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2001年10月，17(5)，636—641页。
- ⑩⑥ Yu Changchun, Xie Li et al. Genetic analysis on Tuoba Xianbei remains excavated from Qilang Mountain Cemetery in Qahar Right Wing Middle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FEBS 580(2006), 6242 - 6246.
- ⑩⑦ Haijing Wang, Binwen Ge, Victor H. Mair, et al.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Remains From Lamadong Cemetery, Liaoning,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34(2007) 404 - 411.

责任编辑：孙建华